

经学、科举与宋代古文

Confucian Classics Studies,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System and Ancient Style Essays
in Song China

方笑一 著

 浙江大学
ZHEJIANG UNI

升剡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升彼
天是極智矣富人蒙此惇獨
正月

经学、 科举与宋代古文

方笑一 著

Confucian Classics Studies,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System and Ancient Style Essays
in Song China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学、科举与宋代古文 / 方笑一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 11
ISBN 978-7-308-17501-2

I. ①经… II. ①方… III. ①经学—研究—中国—宋代②科举制度—研究—中国—宋代③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宋代 IV. ①Z126.274.4②D691.344③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46926 号

经学、科举与宋代古文

方笑一 著

责任编辑 宋旭华
责任校对 王荣鑫
封面设计 续设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44 千
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7501-2
定 价 7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古文”的意义指向:时间性、体式特征与价值观念	(1)
第二节 宋代经学影响古文的途径分析	(8)
第三节 科举与宋代古文的关系	(11)
第四节 研究现状与研究方法	(13)
第一章 宋代官方经学与科举	(14)
第一节 宋初帝王对经学发展的推动	(14)
第二节 兴学校与改科举:经学从变化到定于一尊	(32)
第三节 北宋晚期新学在官学和科场的命运	(42)
第四节 南宋初期官方学术格局的变化	(52)
第二章 宋代士人的经学活动与经学新变	(59)
第一节 宋初的经学传授与古文家群体	(59)
第二节 庆历之际的经学新变	(67)
第三节 欧阳修本于人情事理的经学观	(74)
第三章 经学与宋代古文理论及创作	(80)
第一节 宋初尊经前提下古文理论之分歧	(80)
第二节 范仲淹、孙复、石介的经学与古文	(91)
第三节 经学对欧阳修古文理论及创作的影响	(100)

2 经学、科举与宋代古文

第四节	熙宁科举改革与所谓“经术派”古文家·····	(109)
第五节	“三苏”经论的写作实践·····	(114)
第六节	朱熹与永嘉学派的经学观念与古文·····	(132)
第四章	宋代经解序文的特征与流变·····	(156)
第一节	经解序的起源与宋以前的发展·····	(156)
第二节	宋代经解序的形态变化与学术诉求·····	(161)
第三节	宋代经解序的文体选择与文学趣味·····	(170)
第四节	宋以后经解序的创作倾向·····	(175)
第五章	宋代科举策问的内容与形式·····	(179)
第一节	发解试和省试策问的形态·····	(180)
第二节	殿试制度确立与殿试策问研究现状·····	(189)
第三节	殿试策问的内容与形态·····	(197)
第四节	经学与时务策问的结合——以《礼》学与礼制策问为例 ·····	(213)
第六章	宋代科举策文的话语与形态·····	(227)
第一节	科举策文的话语分析·····	(227)
第二节	殿试策文文本形态的演变·····	(239)
第三节	殿试策文形态特点的形成·····	(249)
主要参考文献	·····	(259)
后 记	·····	(271)

绪 论

本书主要讨论经学、科举与宋代古文三者之间的关系,关注的核心对象是宋代古文。我们想要弄清,宋代古文在当时的经学和科举的影响之下,究竟呈现出怎样一种面貌,具有怎样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又是如何延续到后世的?本书的讨论方式是个案式的,围绕着宋代古文的写作实践和文本进行,也会涉及一些古文观念层面的问题。在进入正式的论述之前,有必要先对相关的概念稍作阐释。

第一节 “古文”的意义指向:时间性、体式特征与价值观念

根据一般文学史著作的说法,“古文”指以单行散句为主要特征的那一类文章,也就是通常所谓“唐宋古文”之“古文”。近年来有学者发现,宋人在使用“古文”一词时,所指的对象要宽泛得多。吴承学通过考察宋代文章总集,认为宋人心中之“古文”有广狭二义之分:“宋人心目中的古文,主要是在于高古的艺术旨趣方面,只要是符合他们旨趣的,都可以称为古文。在形式上,古文以散体文为主,但并不绝对排斥骈体文与辞赋。总之,古文即古雅之文,非时俗之文,这是宋人广义的古文观念。”狭义的古文则指“产生于唐代的比较短小的、思辨性强的、有真知灼见的议论性

文体”。^①他又指出：“‘古文’本身并没有明确的文体分类含义，在文体学上具有开放性、含糊性和有弹性内涵的特色。‘古文’包括什么文体，或者什么文体可称为‘古文’，都是见仁见智的。在形式上，古文以散体文为主，但并不绝对排斥骈体文、辞赋甚至诗歌。”^②显然，这里所说的广义的“古文”，是以散体文为主，又可以包括进骈体文、辞赋甚至诗歌，它实际上几乎指涉了除词、小说、戏曲之外的所有古代文学的文类。假如本书使用这个“古文”概念，来探讨经学、科举与宋代古文的关系，那么基本上就等于讨论经学、科举和整个宋代文学的关系了，这并非本书的论旨所在。然而，我们关注的古文，其范围又比吴先生所说狭义的古文，即“产生于唐代的比较短小的、思辨性强的、有真知灼见的议论性文体”稍宽，不只是议论性的，凡是记叙性、抒情性的文章，只要它是用散体为主写成的，都是古文。

那么本书所说的“古文”，是否可以简单等同于散体文呢？并非如此。我们认为，“古文”概念的意义指向了三个方面：时间性、体式特征与价值观念。

“古文”的时间性指向是显而易见的，“古文”之“古”首先是一个时间概念。大量的例证表明，在宋人的观念中，“古文”是与“时文”相对的一个概念，这里的“时文”，主要指当时流行的、占有主流地位的文体，尤其是科举考试的文体。当“时文”为诗赋时，古文就与诗赋相对，当“时文”是骈文时，古文就与骈文相对，当“时文”是经义时，古文又和经义相对，这也就是上引吴承学先生论述中所言的“非时俗之文”。

在体式特征方面，它是以散体，即单行散句的行文为主的。清人包世臣曾说：“唐以前无‘古文’之名。”^③这并不是说，唐以前没有“古文”一词，只是说“古文”作为一个文体概念，在唐以前未曾出现。清人吴敏树说得更具体，他指出：“盖文体坏而后古文兴。唐之韩、柳，承八代之衰而挽之

① 吴承学：《宋代文章总集的文体学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② 吴承学：《中国文章学成立与古文之学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

③ 包世臣：《零都宋月台古文钞序》，《艺舟双楫·论文三》，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第67页。

于世,始有此名。”^①古文是在文体走向衰弱之后方才兴起的,是韩愈、柳宗元的时代才有的一个概念。刘师培则说:“当时之士,以其异于韵语偶文之作也,遂群然目之为古文。”^②他们都注意到,“古文”作为文体概念始于韩、柳,它的体式特征主要是“异于韵语偶文之作”,也就是非韵非骈的散体。

“古文”这一概念在时间性和体式特征方面的意义指向,是比较容易获知的,前人也已经有了不少讨论。假如说,“时间性”和“体式特征”都是相对客观的东西,那么我们需要指出,在两者背后,还存在着一个更加主观的指向,即“古文”一词所蕴含的价值观念。这是下面所要着重讨论的。

让我们回到中唐韩愈那里。韩愈之前出现的“古文”一词,基本上指古文字或者古文经,而在韩愈自己的文章中,曾多次使用“古文”来指文体。这位唐代古文倡导者涉及“古文”概念的这些表述,对于理解“古文”的内涵是极其重要的。

如韩愈谈到自己的文章写作云:“仆为文久,每自则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及示人,则人以为好矣。小惭者,亦蒙谓之小好;大惭者,即必以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于今世也。”^③从这段话中,我们不难明确以下几点:一、韩愈对自己文章的评价与世俗迥异。二、韩愈称当时主流的文章是“俗下文字”,而“古文”显然是指与之相对的、他“意中以为好”的文章。三、韩愈为“古文”不能为今世所认同感到苦恼,最后一句中的“直”是“竟然”的意思,他感叹古文既然不为今人认同,那么它在今世又有什么用呢?显然这里有愤愤不平的意思。韩愈另一处言及古文,则是其《师说》的最后一段:“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

① 吴敏树:《与筱岑论文派书》,《梓湖文集》卷六,清光绪十九年(1893)思贤讲舍刻本,《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2002,第1534册,第196页。

② 刘师培:《论文杂记》,《中国中古文学史 论文杂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第120页。

③ 韩愈:《与冯宿论文书》,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96页。

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①这段话中，韩愈非但提到李蟠好古文，而且也提到他通习六艺经传，在韩愈看来，在古文和经学两方面都同时有所爱好并愿意学习的，就是“能行古道”。显然，这里透露了韩愈意识中的古文、经传、古道三者间的密切关系。在韩愈《考功员外卢君墓铭》中，出现了“愈能为古文业其家”这样的说法，^②表明其对古文的写作具有相当的自觉，并对自己的古文家身份有所认同。在《题哀辞后》中，韩愈对于自己写作古文的目的有这样的自述：

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③

这段话包含着极为丰富的信息。首先，我们很清楚地看到，韩愈所说的“古文”，从体式上来说，其句读是与当时的骈体文不同的。更为重要的是，韩愈的目的并不在于古文本身，他要学的是“古道”，想念的是“古人”，“古文”是表述或者表现“古道”的文辞，韩愈学习古文本是“兼通其辞”，这里的“其”，指代的正是“古道”，为了强调这一点，韩愈特意说明，自己“本志乎古道者也”。

韩愈的这番话非常重要，它使我们明白，“古文”其实与散文是不能完全划上等号的。因为韩愈在使用“古文”一词和提倡写作古文的时候，他不仅是将这种文章看作以单行散句所构成的文本，而是规定它必须是表述“古道”的文本，古文，就是“古道”之“文辞”。由此可见，在韩愈的话中，“古文”是一个含有鲜明价值判断和价值观念的语汇，它与古人之行与古人之道，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是密不可分的。

这种对古文的认识，几乎可以说是中唐古文家的共识。如李翱也说：“吾所以不协于时而学古文者，悦古人之行也。悦古人之行者，爱古人之道也。故学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

① 韩愈：《师说》，《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一，第44页。

② 韩愈：《考功员外卢君墓铭》，《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六，第353页。

③ 韩愈：《题哀辞后》，《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五，第304—305页。

可以不循其礼。古之人相接有等,轻重有仪,列于经传,皆可详引。”^①由此可见,古文与古人之行、古人之道、古人之礼,以及记录所有这些的经传,都是连为一体的。李翱又说:“自贞元末以至于兹,后进之士其有志于古文者,莫不视公(韩愈)以为法。”^②道出了韩愈的古文及其对古文的看法,在当时士人中的表率意义。

南宋陈造曾说:“古文衰于东京,至唐韩、柳则盛,未几复衰,至本朝欧公复盛,起衰为盛。”^③可见宋代古文,被宋人认为与韩、柳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考察“古文”一词在宋代的使用,我们发现,有三个人对“古文”下过比较明确的定义,他们皆为北宋人物。第一位是宋初的柳开,第二位是北宋前期的僧人智圆,第三位是北宋后期的唐庚。柳开的定义常被提及,而对后两位的定义学界鲜有关注。在我们看来,三者都极为重要,皆须细加辨析。

柳开说:

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予不能味吾书,取吾意,今而视之,今而诵之,不以古道观吾心,不以古道观吾志,吾文无过矣。吾若从世之文也,安可垂教于民哉?亦自愧于心矣。欲行古人之道,反类今人之文,譬乎游于海者乘之以驥,可乎哉?苟不可,则吾从于古文。^④

从“古文者”到“是谓古文也”,可说定义得相当完整。古文究竟是怎样一种文章?柳开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来定义它。从形式而言,它有两个特点:一是并不辞涩言苦,让人难读。也就是说,古文在形式上并不是

① 李翱:《答朱载言书》,《全唐文》卷六三五,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3,第6412页。

② 李翱:《故正议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礼部尚书韩公行状》,《全唐文》卷六四〇,第6462页。

③ 陈造:《题六君子古文后》,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第256册,第256页。

④ 柳开:《应责》,《河东先生集》卷一,《全宋文》,第6册,第367页。

对古人文章言辞的单纯模拟，不能为了追求“仿古”的效果而与当代读者故意制造区隔；二是“随言短长，应变作制”，这里的“言”，指口语，即古文的文句必须根据口语进行忽长忽短的变化，在适应这种变化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体制。从内容而言，古文要“古其理，高其意”，其中的道理要古，立意要高，怎样才算“古”和“高”呢？判断的标准在于“同古人之行事”。古文要符合古人之行为处事，那样才叫古文。

柳开这个定义极富针对性。首先，它针对了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机械摹古的文风。例如北朝西魏苏绰所作《大诰》，初唐陈子昂的部分文章，中唐樊宗师的佶屈聱牙的作品，甚至韩愈热衷于使用古人难词怪字的某些文章，都有机械摹古之嫌。柳开在此声明：“古文”之“古”并不在于言辞的复古和晦涩，等于否定了机械摹古的做法。其次，它针对了当时广为流行的骈体文。“随言短长，应变作制”，等于否定了“骈四俪六”，人说话不可能句句对偶，也不能总以四、六字句为主，古文的句式应当灵活变化，而不是呆板对偶。最后，它针对了当时的一般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柳开要求古文“同古人之行事”，其实就是变相否定了今人之行事。由此看来，柳开所定义的“古文”，绝不是指单纯的复古文章，也不同于当时流行的骈文，而是一种新文体，这种新文体是他所刻意提倡的。提倡它的目的，从他后面的论述不难看出来。柳开“欲行古人之道”，故而认为自己不能从事于“世之文”、“今人之文”，否则就会像乘骥游海一样荒唐。所以，他必须提倡一种不同于当时一般文章的文体，这就是古文。他要通过写古文来行古道。

第二位为“古文”下定义的是僧人智圆，他说：

所谓古文者，宗古道而立言，言必明乎古道也。古道者何？圣师仲尼所行之道也。昔者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六经》大备，要其所归，无越仁义五常也。仁义五常谓之古道也。……非止涩其文字，难其句读，然后为古文也。果以涩其文字、难其句读为古文者，则老、庄、杨、墨异端之书亦何尝声律耦对邪？以杨、墨、老、庄之书为古

文可乎？不可也。^①

显然，这段话中有些与柳开的定义相当一致，比如也提到古文必须依据古道来立言，必须表现古道。而“非止涩其文字，难其句读，然后为古文也”云云，与柳开的表述如出一辙。但智圆的定义也提供了新的内容。第一，在内容层面，他具体指明了古文所表现的“古道”究竟是什么东西。它是“圣师仲尼所行之道”，是儒家的“仁义五常”；第二，在形式层面，他指出并非所有不讲究声律对偶的文章皆可称为古文，比如老、庄、杨、墨这些异端之书就不算古文。

唐庚对“古文”的定义，与以上两位有较大差别，他说：

迩来士大夫崇尚经术，以义理相高，而忽略文章，不以为意。夫崇尚经术是矣。文章于道，有离有合，不可一概忽也。唐世韩退之、柳子厚，近世欧阳永叔、尹师鲁、王深父辈，皆有文在人间，其词何尝不合于经，其旨何尝不入于道？……所谓古文，虽不用偶俪，而散语之中，暗有声调，其步骤驰骋之，皆有节奏，非但如今日苟然而已。^②

我们知道，王安石在神宗熙宁时期感叹“士弊于俗学久矣”，而欲“以经术造之”，^③遂改革贡举，以经义试进士，唐庚所言“士大夫崇尚经术”、“忽略文章”的风气，即与此有关。他的“古文”定义，显然就是针对这种士林风气而发。虽然也提到韩愈、欧阳修等人文章与道的密切关系，但他显然不是要强调文章“合于经”、“入于道”的一面，而是要唤起人们对文章形式的重新重视。所以，他接下来定义“古文”，就仅仅从文辞形式层面而言，古文虽不用偶俪，用散语，但并不等于在形式上无所追求。相反，散语中也暗藏声调，富有节奏，并不是用散语写的经义都可称为古文。

① 智圆：《送庶幾序》，《闲居编》卷二九，《新纂续藏经》本，东京：国书刊行会，1975，第56册，第908页。

② 唐庚：《上蔡司空书》，《唐先生文集》卷一五，《全宋文》，第139册，第310页。此书作于徽宗大观元年（1107），见马德富：《唐庚年谱》，《宋代文化研究》第三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第217页。

③ 王安石：《周礼义序》，《王文公文集》卷三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第426页。

综观宋人对“古文”所下的三个定义,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定义皆具有明显的现实针对性。柳开所针对的是“世之文”、“今人之文”,也就是不能够“随言短长,应变作制”的骈体文;智圆针对的是那些虽具散体形式,但不符合儒家之道的“老、庄、杨、墨异端之书”;唐庚针对的则是熙宁贡举改革之后盛行的不讲究声调、节奏的经义之文。假如将三人的定义加以归纳,可以得出结论,宋人所定义的“古文”,是以阐明儒家之道为宗旨,以散体为体式特征,同时讲究声调和节奏的一种文章。更为重要的是,当上述三人定义“古文”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指出,古文并不仅仅是散体文,而是符合儒家之道,却与当时流行的文章相对立的文体,无论流行者是骈体文还是经义文。

从韩愈至唐庚,关于“古文”的这些定义和论述说明,古文在中唐至北宋人的心目中,既与古道紧密相连,又要符合经书的内容,既不能机械模仿经书的文辞形式,又要讲求声调节奏。而最为关键的,还是必须合于古道。因此,唐宋人提倡古文,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这个取向和追求的核心,就是儒家之道。

第二节 宋代经学影响古文的途径分析

经学是研究儒家经书的学问。西汉设立五经博士,使得《诗》、《书》、《礼》、《易》、《春秋》五部儒家典籍成为官方确认的经书。汉代以后,经书的范围逐渐扩大,经历了“七经”、“九经”、“十二经”的阶段,最终定格于“十三经”。

经学研究儒家经书,究竟研究什么呢?它主要是对儒家经书文本的内容进行诠释。由于经书文本形成年代较早,流传过程中其形态又都经历了诸多变化,导致后世对经书文本的理解出现困难和差异,因此需要加以诠释。诠释又不外乎两种倾向,一种以有助于理解经书文本的意义为旨归,偏重客观;另一种则以借助经书阐发自己的思想观念为务,较多地

将自己的思想加进诠释之中,偏重主观。这两种倾向有时并不能截然分开,对诠释经书贡献的大小也不能一概而论,但它们都以经书文本内容为核心,对经文加以诠释(包括字词、名物等的训诂和义理的阐发),以及对经的注释,包括传、笺、注、疏等进行探讨和比较。

经学的最终旨归,是力求对经书的文本内容作出正确的解释。当然,这里所说的“正确”,与其实达到的效果未必是一回事,但无论如何,寻求对经文的确解一直是经学的首要目标。即使带有强烈官方色彩的经学,或是带有学者个人强烈主观偏向的经学,在解释经书的时候,在其诠释体系内部,也必然遵循这一目标,尽力做到自圆其说。也正因为此,经学作为一种学术,在解释经文这一点上,不同时期或者不同学派之间,是可以相互比较的。

然而,经学又不仅仅是对经书的诠释。官方往往试图以经学统一人们的思想,学者们也借助经学表达自己的观念。撇开经学的官学或者私学性质不论,单就学理层面而言,经学至少还应该包含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对于经书的性质、地位、效用等的认识;其二是关于如何阅读经书的观念;其三是对经书诠释方法的讨论;其四是经书诠释中所体现出来的思想倾向;其五是对经书与天地、社会、自我等关系的理解。这五个方面虽然围绕经书展开,但比经书文本的诠释本身更宏观,也更抽象。假如再考虑到经书文本的流传、各家注疏的刻印流布、经学学派的传承等历史因素,那么以儒家经书为核心所编织起来的这一个学术网络就相当强大,其对社会文化诸领域的影响力更不容小觑了。

经学影响宋代古文的途径又有哪些呢?这可以分几个方面来细论。

首先,经学为写作者提倡古文提供了理论资源。我们知道,中唐到北宋文章的书写方式发生了巨大的转换,简而言之,一部分文类的书写方式,由骈体变为散体。而另一些文类则保持骈体不变。经过这次转换之后,某一文类究竟用骈体还是散体写,作者们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也就是说,大家会自觉地去运用骈体或散体写某一类文章,不会混淆。因为这样一个过程是一些作者刻意倡导,并且打着复兴“古文”的旗号进行的,古文

作者们强调自己写的文章是追迹古代文章,又为古文赋予了明确的价值观念,强调其中所蕴含的儒家之道,那么,他们必然尊崇作为儒家之道载体的经书,必然在理论上将经书奉为文章的楷模。然而,经书的崇高性和权威性并不是亘古不变,而是需要不断论证的,这就要用经学来论证和彰显。也就是说,在推尊儒家之道这一点上,经学和古文有着一致的目标,将儒家的地位抬升得越高,对于提倡古文就越有利,而经学恰恰可以提供丰厚的理论资源,提升儒家的地位,帮助古文扩展影响力,促进文章写作方式由骈体向散体的转换。经学能够为文章书写方式的转换赋予某种合法性,将这一转换更大程度地与对古道的追求联系起来,使其具有价值观上的意义。

其次,经学为古文立意的提升提供了新的动力。宋代经学的一大特征是“疑经”,在推尊儒家经书的同时,又怀疑一部分经书文本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同时怀疑前人传注的正确性,这一疑经之风虽然使一部分经书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但目的是为了摆脱前人的传注,而直接探求经书的“本义”,在这样的情形下,儒家经书的地位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通过怀疑和重新诠释,经书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宋代古文中包括不同文类,其文本欲阐扬儒家之道,必然要借重经学所揭示的经书义理。在奏章、序、记等各个文类中,通过诠释经书话语来确立文章意义的例子不胜枚举。五经的话语在古文中俯拾即是,它们经过作者的诠释,抽绎出高远的道理,成为一篇文章的主意所在。主意既立,文章的品格一下子提高了,所记载的寻常人、事、物变得富有深意,与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联系起来,放射出异样的光彩。而疑经之风所带来的怀疑的思维方式,也让古文的主意变得更为丰富,惯常的思路和视角被颠覆,新异的思维和事理被重视和运用,宋代古文因之而呈现更为多元的面貌。

最后,经学催生了几类直接与与之相关的文类。这些文类虽属于“次文类”(sub-genre),即一个传统的大文类底下的小类,但都与经学密不可分,没有经学,也就没有这些次文类。比如经论、经义,隶属于论说文,但都和经学直接相关,可以说是代表了区别于传注的另一种经书诠释方式。

又如经书和经解的序跋,是序跋类文章中的一个小类,但所写的对象是经书和经解,具有相对独特的形态和意义。经论比较宏观,有构成一个系列的五经论、六经论,也有单独就某部经书而写的,写作视角多样,体现了宋人对经书的总体看法。经论的繁荣是宋人对经学的一大贡献。经义产生于熙宁科举改革,是一种科举文体,专门要求考生阐发经书中某一句或者两句话的意义。与经论不同,经义的书写如其他科举文体一样,并不是完全自由的。它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当然也形成了某些固定的模式。经书和经解的序跋,内容更为复杂,但主要围绕经书和经解中的学术思想以及经书、经解本身的流传和形态,又保留了序跋类文体的写作传统所带来的一些特征。当然,如果以古文、时文两相对立的角度而论,经义也可以说是一种时文,而非古文。但这种时文和科举中的策、论等一样,都是从古文内部生长出来的,以单行散句为主,而不是骈俪之体。经义和经学、科举两者都有关系。

当然,经学对宋代古文的影响途径远远不止以上提到的三个方面,正如经学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那样,这种影响也包含相当复杂的情形,这里只是举其大要而已。

第三节 科举与宋代古文的关系

关于科举与宋代古文的关系,前人已经有过较多的具体论述,这里仅就宏观层面提出几点并作简要讨论。

首先,假如我们承认提倡并实践古文的写作是一场“运动”,那么这场运动的最终成功应该归功于北宋的科举制度。在熙宁科举改革之前,进士科主要考诗、赋、策、论,其中诗、赋是韵文,策、论是非韵文,在北宋前期,科举中的诗赋和策论之争相当激烈,从取士的有效性出发,到底考诗赋还是考策论,如果两者都考,究竟是诗赋在前还是策论在前,是逐场去留还是多场通校,这些都关涉诗赋和策论在科举考试中地位的高低。地

位越高,对取士的决定性影响就越大,当然也就越受到考生的重视。总体而言,在熙宁以前,策论的地位有所上升,重要性日益凸显。熙宁改革之后,进士科诗赋被取消,策论被保留,还增加了经义,这样一来,经义、策、论成为最主要的考试文体。经义是新生的科举文体,从一开始就是散文,策、论过去用骈体写作,在熙宁改革之前,已经变为散体。因此,熙宁之后主要的科举文体都是散文,只有词科中考骈体文的写作,因为词科涉及公文写作,这些公文大多用骈体写作,一直没有变化。即使后来恢复了诗赋考试,但也仅仅是恢复韵文,而没有恢复骈体文。因此,北宋科举考试对于一部分文类由骈体变为散体,并且得以巩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假如没有科举的制度保障,古文的推行不会那么顺利,其结果也很难预料。

其次,在科举制度和古文写作相对稳定之后,古文家对于古文写作经验的总结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应付科举,但在客观上,它们对总结古文创作的实践经验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南宋吕祖谦编选的《古文关键》等几部古文选本,以及《崇古文诀》、《皇宋精选策学绳尺》、《论学绳尺》、《太学新编黼藻文章百段锦》、《文章轨范》等,都与科举有关。从当时的情况而言,这些书编纂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指导举子应付科举考试,然尤其需要指出几点:一是这些选本开创了对于古文的形式研究。其中为古文划分段落,总结如何开头,如何结尾,段与段之间如何过渡,句与句之间如何衔接配合,实词虚词如何运用等等,都属于形式分析的范围,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古文在形式上的特征。二是树立了古文的批评标准。什么样的古文才算出色,什么样的创作倾向应当避免,即使这是为科举服务,但也让我们看清了当时人是怎样评判古文优劣的。三是促进了古文的经典化。本来为准备科举考试而挑选的古文作品,后来渐渐被奉为经典,为一系列选本所吸纳,成为人们长久传诵的名篇。

最后,古文中的一部分文类成为科举文体之后,进一步走向程式化,成为既适应科举考试,又具有独特特征的文类。这主要是指策、论、经义三个文类。它们最终被视为与古文相对立的时文,但这些时文是在科举